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目 录

[illegible]

二师二团战斗历程的片断回忆

王思旭

编者按：本文作者王思旭同志，原系我一军二师四团前身十四支队一个连的文书，后调二团团部任文书工作。他根据当时的战斗，将整编、训练、生产等执行任务情况，概括写成《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回忆录一份。本文系其中后一部分的节录。

一九四八年二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开始战略进攻阶段之局部进攻时期，我二团①随旅向国民党统治地区挺进，于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一日在宜川瓦子街与敌激战，二十九日十时，我二团接替了三团三营阵地，并准备夺取元宝山，即日下午至三月一日，我二团三营坚守阵地，一、二营向元宝山之敌进攻，经顽强激烈地白刃搏斗，反复争夺二十余次，和我三五八旅一起，歼灭敌二十九军军部和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十个团，取得了西北战的空前大捷。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我二团随旅参加西府战役，十七日六时，将张洪镇之敌包围，十时开始攻击，在炮火支援下，我二团二营竖梯登上寨墙，战斗20分钟，全歼陕保十九团一个连及部分武装，俘敌连长以下200余人。

四月十八日晚，我二团参加攻克彬县之战斗，首先占领北关及汽车站，继之突入城内，敌退于南山上，我二团二营立即逼近

①原属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一〇二师独一旅的一个团。

敌阵地，发起攻击，五连一排受阻，该连八班在周黑子的带领下迅速绕至敌侧翼，突然开火。用小包围之战术，直捣敌指挥部，将敌分割歼灭，并生俘敌少将专员兼保安司令乔维森，及少将指挥官赵玉章以下250人，缴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80支、电台两部，战后荣获师“周黑子英雄班”光荣称号。彬县战斗结束后，二十一日继续西进，敌地方武装闻风而逃，廿二日我二团随旅攻克麟游。

四月二十日我二四团随旅进至泾阳河畔，准备攻打宝鸡城。二十六日拂晓，肃清外围后，我二团在城西北马家原、何家原以及西堡子，俘敌保警队100余人，抵西门后，我二团三营在西门立即登城，继续向前发展，并打击敌人之反冲击，团直沿城墙及城内大街向东及南关猛烈攻击，至下午五时，将敌全歼，攻克宝鸡。此次战斗中，我三营九连六班出色完成战斗任务，荣获师“宝鸡登城第一功”光荣称号。

我军攻克宝鸡后，胡宗南及马步芳敌军联合向我反击，我二团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五、六日，在玉都庙英勇奋战，八日又在三嗣打阻击，在战斗中指挥果断，动作迅速，终于摆脱了围攻。西府战役结束后，我二团于十五日随旅进黄陵七里铺附近休整，进行评功查过和大练兵运动，达两月之久。

一九四八年八月八日至十三日，参加澄、郃战役。我二团在王庄镇痛击守敌，又追歼其敌尾部，予敌整编三十六师以沉重打击。此战役结束后，立即进行秋季整训，开展诉苦为中心的阶级教育和大练兵运动，为向蒋管区挺进创造了条件。

十月六日，随旅参加荔北战役，进至敌四十八旅旅部驻地时，发现敌正集结准备逃跑。我团二营即从西南、正南攻入北酃酃，和我三五八旅一起歼灭敌四十八旅旅直一部，及一四二团两个排，一四三团一个营。七日晨，我二团奉旅命令向唐家堡、王武村之敌进攻，发起冲锋后，迅速占领了唐家堡及庙底，敌全线溃乱，我二团乘胜追歼残敌至打虎寨、段家寨的敌一部。我团直

和一、三营在北党集结，我团二营追至花园头，俘敌100余人。八日午返回北党附近王武村集结，至此，荔北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我二团随旅至永丰镇休整。

荔北战役结束后，胡宗南为挽救其败局，乘我休整之际，向我突然反扑。为了歼灭敌人，我二团奉旅命令在北党、王武村、杏子河地区，构筑更深的防备阵地，坚决抗击敌整编第一师之进攻。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敌向我一营阵地进攻，并以飞机十余架轮换轰炸，经激烈战斗后，一营伤亡较大，阵地失守，后在兄弟连队支援下，奋力反击，制止了敌人向我纵深发展，并积极组织反冲击，后因奉令向北转移，于黄昏撤出战斗。十一月二十二日，我二团参加野战军发动的冬季进攻战役，首先向康庄之敌攻击，激战一小时，全歼守敌，进占康庄。十二月初，进至白水新耀镇一带，进行冬季整训，开展大规模的评功、比英雄的教育及练兵运动。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统一编制，一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独一旅命为步兵第二师，我二团编为二师第四团，下属团直和三个步兵营，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

二月二十五日，军决定改变部署，于现地集结，以战斗姿态休整待令，并协同地方开展新区群众工作。我四团随师移至庄子镇、觅子镇地区休整，为诱敌深入，待机歼敌，我四团于三月十八日，又转至新耀镇休整。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军颁布进军命令，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解放了敌人的大后方——南京。我四团于五月二十日，随师奉令追歼胡部五十七军。接受任务后，立即出发，以三小时急行军四十里，首先占领麟凤公路姚家沟口、罗家坡地区，我四团三营迅速控制老君顶要点，先敌开火，先敌发起冲击，击溃敌之行军队形，将敌堵于沟内，趁敌尚未展开，集中轻重机枪、六零迫击炮，猛烈向敌开火，敌乱作一团，我三营以七连在中、八连在左、九连在右，象三把尖

刀直插敌群，将敌分割，包围歼灭，俘敌2,000余人，我四团一、二营迅速向敌纵深发展。此次战斗，我四团荣获军“勇猛机智”的光荣称号。六月十一日我四团随师南移，于十二日在澄城县东西地区，十六日奉师命令在杨家准、前后寨，向渭河北岸组织防务。

随着全国胜利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已基本灭亡。为加速解放大西北向敌展开全面进攻，我野战军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发动了扶风、郿县战役，十二日，在扶郿战役中，我四团为师的二梯队至横曲镇时，我四团二营迅速占领横曲镇，截获逃敌一部，此时敌全线溃乱。军即令我师向槐芽镇郿县追击，我四团不顾疲劳，奋勇前进，至槐芽以东，歼俘涇水南逃之敌500余名，于黄昏前抵郿县东南地区，正遇敌涇水南逃，我四团当即发起多路突击，敌已溃不成军，完全失去斗志。遂与我一师三团一起，当于河滩俘敌二十四师、三十八师、六十五师、一一九师各一部及九〇军军部8,000人，我四团二营四连在此战斗中，英勇顽强，猛打猛冲，荣获师“猛打猛冲立头功”的光荣称号。

我四团于秦安地区休整后，随师进军宁夏，解放青海，奉令于八月十一日，围歼陇西之敌。我四团当即出发并于二十一日西渡洮河，向宁夏开进，守敌西逃，我即向宁夏追击，在追击中，我四团二营于宁定北截获青马敌军骑兵二旅一团之一部，俘敌300余人，缴获机枪9挺、冲锋枪2支、步枪19支、子弹900余发，并有一个骑兵排向我投诚。

在解放青海的战斗中，我四团随师于八月二十八日北渡黄河，向西宁急进，青马残部逃至西宁后，极度混乱，匪首乘飞机逃跑，所有残部全部溃散，我军昼夜兼程西进，于九月五日进至西宁，上级迅速地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并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维持地方治安。至此，青马反动武装完全覆灭，青海全部解放，青海各族人民永远结束了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命运，结束了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获得了新生。

从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二年八月，在这三年青海建设中，我二师四团坚决担负起剿匪肃特，建立人民政权，巩固社会治安，支援解放西藏以及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等项重大任务。全团干部战士均以继续革命的觉悟，努力奋斗，为建设新青海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青海解放初期，我各级民主政权尚未建立，为了开辟西宁市及农业区内之工作，我四团奉师命令驻进湟源（二、三营）、哈拉库图（一营），担任城防守备及执行剿匪任务。首先做到耐心细致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依靠广大贫苦农牧民，团结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打击反动的叛乱分子，并实行民主改革。部队住在回民区，不进清真寺；住在藏族区域，不进喇嘛庙。为了尊重回族的风俗，部队通过回族区的时候，炊事班的同志把盛过猪油的油桶、锅、碗、瓢、勺用火烤过，用水煮过，直到闻不到一点油腥味，回族群众高兴地说：“从古至今，只有共产党才尊重我们的信仰，保护我们的清真寺，把我们回民当人看待。”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是青海地区马步芳匪帮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并组织了大规模的暴乱，企图在青海复辟反动统治。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我四团在湟源、湟中地区执行剿匪肃特任务，先后参加了泳沟追击、大石山合围以及龙葱沟、稍吉里沟、小峡等地区的剿匪战斗。采取分区联防、军政兼施，成立武工队建立情报网等，共参加剿匪战斗22次，俘敌109名、毙匪30名、收容散兵165名，坦白登记者31名。使社会治安日益巩固，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了农业生产。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我四团在湟源之城关、西源、南源、协河四个地区组成四支武工队，计73人，开展地方工作及进行军事清剿，并发展自卫队员4,222人。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西北军区指示：我军长驻青海，

担任彻底摧毁反动统治，建设人民新青海的光荣任务。据此，部队进行了扎根青海的教育。为了加强地方力量，建设县、区政权，我四团自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〇年九月先后抽调217名干部，分区负责，大力协助湟源建设地方政权，九月，军又决定以全军各支部抽调四人（其中干部党员一人、老战士党员三人）担任地方工作，加强了地方力量。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军委作出：“发展国民经济，增加社会财富，减轻人民负担，实行有匪剿匪，无匪生产”的决定，我四团于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至八月十五日在湟源县东至多巴、西至三角城、南至黄河的350华里的农产区，进行大生产运动。我四团发扬了大胆创造的精神，使只能做肉食从未耕过地的牦牛学会了耕地，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收获小麦8,607.74石。同年的四月除执行生产任务的同时，我四团接受了修建青藏公路（河卡）段工程，共劳动了56天，参加人工80,560个，修路93,115米。在此工程中全团指战员发扬吃苦耐劳、坚决勇敢精神，战胜了气候寒冷、地势高峻、呼吸困难等艰难险阻，我四团三营九连荣获“修路先锋”称号。青藏公路不仅是为保障我骑兵支队进军玉树，支援解放西藏，而且对今后开发青海，繁荣国民经济，保卫国防，更有重要意义。

一九五一年一月，开展了查斗志为中心的整风评功运动。四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底，又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团破获了“反革命委员会”一案，九月十一日，又进行了整党运动，主要进行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八条标准教育。一月至十一月部队开展了爱国主义与国防的教育。我四团经自愿报名，审查批准100余名干部战士，于三月二十四日到军集中入朝，光荣地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斗。在此一年中，全团主要进行了军事训练，占总时间的60%。我师遵照前委“三年内消灭文盲”的号召，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及军事训练、整党、三反、五反的同时，开展了干部扫

育及文化教育的训练，我一营二连从四月到六月十五日的两个半月里，平均每人识生字230个，多则800个。提高文化对于建设国防军具有决定意义。

一九五二年八月，我二师奉命与八师合编为国防军重装步兵师，我团仍为四团，下辖一、二、三、四营（四营由二十二团一个营编成）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二十二团炮兵连编入四团炮兵连，九月下旬从青海湟源移防至甘肃平凉地区泾川县，继续完成学文化和剿匪两大任务。

我四团自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进驻湟源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赴朝作战为止，计三年又三个月。我团坚决地执行建设新青海的指示，顺利地完成了剿匪肃特、修筑公路、生产、训练、三反、五反、文化教育等项任务，巩固了社会治安，加强了部队建设，增加了国家财富，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强了无产阶级思想，加快了青海建设的速度。

回顾我四团自一九三七年十月于冀中、任丘、雄县、霸县地区成立以来，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引下，在上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以及建设新青海三个时期，经过多次整编、训练，经受了百余次大小战斗的严峻考验和锻炼，终于由一支普通的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壮大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性强，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

一九三七年十月到解放大西北和建设新青海阶段，西北野战军授予我四团“机智勇猛”的光荣称号，并授予奖旗一面；军于1951年第一届英模大会上，授予二营“战斗模范营”称号；一营一连荣获师“钢铁部队”的称号；四连荣获师“猛打猛冲立头功”、“青藏公路为人民立功勋”光荣称号；五连荣获西北野战军授予“百战百胜连”；该连八班在彬县战斗中，以勇猛顽强的战斗意志攻破敌守城的最高指挥部，活捉少将专员兼保安司令乔维森和少将指挥官赵玉璋以下250余人和大量武器，被师授

予：“周黑子英雄班”称号；六连荣获师授予“执行政策纪律模范连”称号；七连被师授予“爱国卫生连”并授予该连七班“英勇抗击的贾七班”光荣称号；九连荣获野战军授予“生产模范连”和“勇猛机智、越战越强”和“宝鸡登城第一功”的光荣称号；八连荣获师授予“夜老虎连”；一营机炮连荣获师授予“模范党支部”称号；西北野战军授予西团供给处“模范供给处”和“积极为部队服务”奖旗一面，以及师授予各营的排、班“集体三等功”、“周黑子式的英雄排”、“周黑子式的英雄班”等。这些用鲜血换来的光荣称号，将激励着我四团干部、战士在和平环境里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争取更大光荣。

抗日战争时期的军统组织及其 在青海的若干活动

钟 世 隆

一九四二年秋，笔者毕业于军统兰州训练班第三期，即被调往重庆军统局本部训练处工作，后又在该局二处敌伪股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调任为青海组长及直属通讯员等职务。现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追记如次，以供参考。

来龙去脉：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党内有派，派中有系。其中以“复兴社”、“CC系”、“政学系”等最为显著，特别前二者竟然以秘密党团形式，吸收成员，各自发展组织，相互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国民党内部之间的严重分裂，以致引起党内外人士纷纷谴责，要求停止一切小组织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迫于形势，另一方面也感到弊多利少，违背了利用派系互相牵制的本意，便决定停止一切小组织活动，处心积虑地改组“复兴社”。这个社原有组织、宣传、特务三处，在组织处、宣传处的基础上，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又将特务处改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CC系”改设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这是“军统”、“中统”的由来。既至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军统”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但“军统”的名目仍沿其旧。蒋介石运用这两把尖刀，纵横捭阖，为所欲为，成为巩固蒋家王朝实行法西斯专政的两大支柱。

抗日战争时期的军统局及其外围：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局

本部驻在重庆罗家湾“漱庐”内，贺耀组、林蔚等人先后担任局长。其实谁担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谁就兼任局长。副局长一直是特务头子戴笠。还有蒋介石侍从室的组长唐纵兼任帮办，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主任秘书。此二人不经常去局本部办公，只是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以及戴笠不在重庆时，代批重要文件，主持“总理纪念周”并讲话等。凡是特别重要的事情，还是用电报向戴笠请示。局本部的内勤组织没有处、室、股等。

秘书室：秘书主任毛人凤，配有秘书三至四人，分管各处室文件批阅事项。下设文书股、译电科、司法科等，各司其事。这个秘书室是驾凌于各处室上的权力机构。

第一处：处长包志鸿，下设国际科主管各驻外国大使馆武官送来的情报，和其它渠道有关国际问题的情报业务。军事科主管各部队谍报参谋送来的情报，以及其它渠道的有关军事情报业务。策反科主管对日伪军的策反活动。

第二处：处长王新衡，副处长王鸿骏，下设敌伪科主管沦陷区政治情报业务。政治科主管蒋管区政治情报业务。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张国焘，主管解放区情报业务以及从事各种反共活动。

第三处：也就是行动处，先后由叶翔之、程一鸣任处长，下设各科股，主管暗杀、逮捕、爆破等罪恶活动。

第四处：也叫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副处长董益三。下设科股，主管各地电讯总台、支台、分台的人事及业务，和电讯器材的制造及购置。还设侦查台、密码研究室。分别掌管窃收国内外电讯和破译侦查台所收电讯及编制自用密码本等。

训练处：处长郑锡麟。设有行政、教材等科股，主管各地训练班的人事及训练事宜，编辑、印刷、分管各种内部书刊，如训练班教材《情报学》、《内勤业务》、《知人方法》、《通讯方法》、《爆破术》、《家风》等。这份《家风》，六十四开本，内容是刊载蒋介石及戴笠的讲话和题字外，大部是鼓动特务分子

效忠卖命的文章。局本部召开的各种会议记录，也由该处人员担任。另外，在各大大学以学生身份掩护的特务，也由该处联系。还有健乐股，专管演戏。

警务处：主管军统所掌握的各省警察局人事及情报业务。当时有些省、市的警察局还由中央军官学校李士珍或各地土皇帝掌握。

总务处：处长沈醉，副处长陈粟冬。下设各科股，主管粮秣、房屋、车辆、用具等后勤事宜。

会计室（后改称经理处）：主任徐人骥，副主任郭旭。主管全局财务会计业务。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局本部定员人数少，而实有人员多，薪金无法开支，则以保密为借口，向军政部用假姓名、假名章按定员人数具领，形成少数人的薪金由多数人用的情况，每个人实际所得薪金，比其它单位同级别的人要少，生活实在艰苦，但谁也不敢吭声。

人事室：主任龚仙舫。下设各科股，主管全局内外勤人员的派遣、调动、考核、福利等事宜，其他各处室所主管单位的人事调动，必须通过人事室办理。该室有一套人事卡片，按姓氏笔画编成总卡片，并有按籍贯或按专长编成细目卡片，按照需要查找，一查便知。

督察室：后期主任是廖华平，下设各科股，负责监督全局各单位工作及每个特务人员的思想言行。该室除了设专职督察人员，在各地巡回督察外，还有“周督察”制度，由各单位每周指定一人为周督察，不经过各该单位主官，而由督察室直接行使职权，召集开会，规定化名及通讯方法，布置任务，负责对该单位进行监督和打“小报告”。如在任期内该单位内有问题而不上报，即负渎职之罪。

摄影股：股长王文钊。负责内部照相事宜，并在珊瑚坝飞机场、码头开设“飞虹照相馆”，也对外经营照相业务。更主要的是在飞机场偷摄所需要的上下飞机人员的照片。

抗日战争时期，局本部下还有秘密和公开两大部份组织。秘密组织方面，各地设区，区下设站，站下设组；也有局直属的站、组、通讯员等，当时在蒋管区有重庆的渝特区，成都的川康区，西安的晋陕区，兰州的西北区。这些区的公开掩护名称，在前是各驻在地的战区司令长官部的“调查室”，以后是各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以下站、组、各自找掩护职业，不给公开掩护职务。在沦陷区纯属秘密组织，只设小组及通讯员，由局本部直接联系。如上海就有三个组，均由局本部直接联系，互不发生横的关系。一方面怕暴露后牵连太广，一方面便于复查核实情报。另外在重庆磁器口设有局本部办事处，先后由潘其武、陶一珊、乐干任主任职务，主管设在该地的“中美合作所”、“训练班”、“渣滓洞看守所”、“档案室”、“四一图书馆”、“印刷所”、“医院”等等。

公开单位方面，则有特检处：处长李肖白。名义上隶属军委会办公厅，实际上由军统局直接指挥，主管各地航空检查所、邮电检查所的人事及业务。

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张炎元。名义上是军委会的直属机构，实际上由军统局直接掌握，在各地车站、码头，设置检查所，主管铁路、公路、水路、码头等过往行人的检查事项，除特务官员外，还配有武装交通警察。

特五团（后改为交通警察总队）：先后团长为王兆槐、刘国宪等人，驻地在重庆望龙门。这是军统局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主管所属各单位的门卫岗哨及“望龙门看守所”，有特殊情况时，可调遣使用。

特别警卫组：由周金华、梁绍周先后任组长，负责蒋介石的警卫工作。在蒋的驻地以及所经路线，有暗有明，遍布岗哨。

兵工署警卫稽查组：组长张师。名义上隶属军委会军政部，实际上由军统局直接掌握，在各兵工厂派驻小组，负责门卫及统治工人。

财政部缉私署：由戴笠任署长，周石甯任秘书。名义上隶属行政院财政部，实际也由军统局直接掌握，各地配备有特务官员及税警，缉查走私漏税，特别是在蒋管区与沦陷区交界线上，稽查往来客商。

别动军总司令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司令是周维龙。以帮会分子为骨干，组织游击部队，到处为非作歹。对日寇汉奸打击不多，对人民群众则骚扰很大。

另外，各地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和警察局侦缉队，都由军统局所掌握，这部份特务作恶多端，罄竹难书，连戴笠自己也承认而骂道：“你们这些人招摇诈骗，胡作非为，老百姓恨入骨髓，要食其肉而寝其皮。”

情报及公文处理情况：局本部收到各地电报、代电或长篇公文，分送各主管单位，先由科员贴“签批纸”，按内容性质，根据规定，拟具报甲（蒋介石）、报乙（参谋总长）、报丙（分公厅）、报丁（局长）、报戊（戴笠）。其中需要积累材料的，则加上“报×并注记”；需要复查的，则“拟飭××复查”；不需要上报的，则批“拟存查”、“拟注记”字样。所谓“注记”，就是在情报对象的卡片上登记下来。“签批纸”手续结束后，送出股长、科长、处长层层签名，上转秘书室核批。各层如有意见，批注后再签名。一般情报或公文，由秘书室主管批“如拟”或画“行”后，就下退各主管单位执行。比较重要的文件，秘书室签送毛人凤至戴笠、蒋介石批示。处理情报如此，其它各处室上下行文，也是这个程式。

凡是一件牵涉到几个单位的业务，则办“会稿”手续，先由主管单位签注意见，再经有关单位签注后，送秘书室核批。上下左右转送文件，都须注明月日时分，以便延误后追查责任。各单位承办文件，规定有一定的时限，一般文件不得超过一周；重要文件限期一天、三天或五天；紧急文件在两三个小时内立即处理。因此，半夜里被叫起来办公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如果延误了时间，重则杀头，轻则禁闭，因此，处理情报及公文的速

度是很快的。为了保密，内外勤上下行文，都用电报或代电，上下款全用化名，一般一年更换一次。

人员来源及训练班：军统特务的来源有两条渠道：一条是各基层单位根据具体工作的需要，报请局本部批准吸收的；另一条是利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名义，开设训练班，欺骗青年学生经有关人员的介绍报考；也有一部份是在职的调训人员，经考试录取的。抗战后期，依靠训练班人员是主要的一个方面。

经常性训练班有四处：一是“息训班”，也叫“西南班”。这个班先在杭州成立，后迁到湖南临澧，再迁至黔阳，最后到贵州息烽。二是在甘肃兰州的“兰训班”，也叫“西北班”。三是在福建建瓯的“建训班”，也叫“东南班”，成立较晚。以上三处训练班的公开名称是：“中央警官学校驻某某特种警察训练班”，其实与李士珍主办的“中央警官学校”分道扬镳，毫无联系。四是在重庆的“参训班”，其全称是“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学生在“中央军校”毕业生中招收，毕业后分派到各部队任谍报参谋。其它如重庆的“高干班”、“通讯班”、“外交班”、“中美训练班”，以及西安等地的“电讯班”等等，都是临时性的组织。其中，息烽、兰州、建瓯等三个训练班的教育方式比较正规，分为前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为入伍期，期限为半年，纯属军事训练；后期为分系训练，时间包括实习半年至一年，计有“情报系”、“警政系”、“电讯系”、“行动系”、“外事系”、“军事系”等等，各班各期分系情况不全一样，有增有减，但也是大同小异。各训练班不论长期、短期或正规、临时的，主任一律由戴笠兼任，具体负责的都是副主任。一般下分“政训”、“教务”、“总务”三个组，学生一律穿上士兵服装，受军事管理。每天晨操开旗时，先唱“国歌”，精神讲话后再唱训练班“班歌”。这首“班歌”，后来变成了军统局“局歌”，在各种盛大集会上都要唱它。特别是戴笠自己唱的得很起劲。其歌词是：“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握着

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着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着国家领土和主权，要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要贯彻三民主义的实现。应当，钢胆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牺牲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不论从那条渠道来的人员，都是职业特务，进出两难，参加时都要经过内部人员的介绍和上级的严格审查，一加入就不准脱离，除非有严重疾病等特殊原因外，一般是不容易批准请长假的。戴笠曾经在大会上一再强调：“你们不要找种种理由请长假，一律不批准；就是出去了也找不到工作。你们像军马一样，在屁股上打了烙印，谁也不会要你们，还是给我好好干。”有极少数游离分子，但是象小孩玩蜜蜂一样，在腿上拴一根线绳，是不能自由行动起来的。

法西斯毒索及其“钢的纪律”。军统除了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统治外，对其所属特务人员，也用封建家长 and 法西斯双管齐下的手段进行控制。思想上不断灌输法西斯毒素，工作和生活上则用所谓“钢的纪律”严格约束。戴笠公然以家长自居，别人有时也以家长称呼，标榜这个组织是“革命家庭”，竟提出：

“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在礼堂的墙壁上大书“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宁静忍耐，伟大坚强”等等法西斯和封建统治标语，煽动和鼓励为蒋介石效忠卖命。随之利用不准背叛、不准泄密、不准搞小集团、抗战期间不准结婚、处理公文不准延误时限、不准贪污盗窃、敲诈勒索、招摇撞骗等等不成文的所谓纪律，由主管单位和督察人员明密监督，如有违犯，重则枪毙，轻则关押。内部把这些惩罚通称为“上学”。这个上学，又有大学、中学、小学之分：情节最严重的要上“大学”，也就是要关进贵州“息烽监狱（监狱长是周养浩）。这里面监禁的有外来的政治犯，也有内部罪犯，不是处以死刑，就是处以无期或长期监